

萧纲《与湘东王书》作年考论

李敏¹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与湘东王书》的作年关乎宫体文学理论的形成及宫体文学兴盛的时间, 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从其所批判的京师文体、裴子野文学集团、谢灵运诗效仿派在京师繁盛和衰落的时间以及萧纲、萧绎的关系演变角度加以考察, 可以推断萧纲《与湘东王书》应作于中大通三年到大同元年之间, 它是萧纲为争取与裴子野文学集团、谢灵运诗效仿派关系密切的萧绎而作, 并在与萧绎的联合中, 开启了宫体诗盛行的时代。

【关键词】:《与湘东王书》; 京师文体; 裴子野文学集团; 谢灵运诗效仿派; 萧绎

【中图分类号】: 1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7)10-042-048

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是宫体文学的理论旗帜, 也是反映梁代中期文坛现象的重要著作, 对其创作年限的探讨, 关乎宫体文学理论的形成以及宫体文学兴盛的时间问题, 学界对此已有颇多讨论, 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日本林田慎之助为代表, 认为此书作于萧纲为太子前, 他在《〈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文学思想》一文中说: “萧纲以梁代谢灵运诗模仿派的诗风为批评对象, 写作了《与湘东王书》。这是他还是在晋安王雍州藩府时, 给多才多艺的弟弟湘东王萧绎写的论文的书简。”^[1] 第二种看法认为此书作于萧纲为太子初期, 这以日本兴膳宏、国内曹道衡、沈玉成、傅刚等为代表。兴膳宏认为, 萧纲“是在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作此书的”, 理由是“在书中受到褒贬、以裴子野殿后的诸大家, 到萧纲被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中大通二年都已不在人间。当时的文学批评不可能提出某个在世诗人的姓名, 然后正面进行批评”, “《与湘东王书》既然直接指责了裴子野, 那么很可能是在裴子野死后所作”。^[2] 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持相同看法。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进一步说: “这封信的确切写作时间已难详考, 但从《庾肩吾传》中所记‘及居东宫, 又开文德省, 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来看, 当在中大通三年后不久。”^[3] 第三种看法则认为此书作于大同时期, 这以清水凯夫、刘林魁为代表。清水凯夫在《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中根据萧纲文学集团中的主要领袖徐擒和庾肩吾先后离开东宫到地方任职, 直到大同元年左右回归东宫的时间推论, 认为“《与湘东王书》是于梁代文学转变时期的大同年间(535-545)的最初几年撰写的, 是‘宫体’文学发展的转机”, 并认为此书是“企图排斥‘古体派’及‘谢灵运派’的文体而扩大和发展‘宫体’”。^[4] 而刘林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系年考》一文, 从信中所表露的心态、萧纲所处的政治环境、宫体诗派的兴盛以及庾肩吾为太子中庶子的时间考证, 进一步把时间缩小到大同六年(540)到八年(542)之间。^[5]

纵观三种看法, 其中第一种的可能性较小, 萧纲文末以曹植比萧绎, 以曹丕比自己, 符合他为太子后的身份。第二种看法推论比较简单, 相比第三种看法的详细考论, 论证显得单薄, 似不足以令人信服。第三种看法考论详细, 但存在推论的不足。对《与湘东王书》作年的讨论, 除了考虑萧纲文学集团成员的活动外, 更应该结合文本所指, 对他所批判的文学集团在京师盛行的情况进行考察, 因为萧纲的创作心态固然重要, 但他批评的对象所构建的文坛情况才是他写作这封信最直接的缘由。萧纲把“京师文体”、裴子野文学群体、谢灵运体模仿派作为批评京师文坛的主要靶子, 以此树立自己的文学理念, 必然是在几派势力旺盛的时候, 倘若他们已然消沉, 则没有批评的必要, 所以考察几派成员的活动更有助于讨论《与湘东王书》的作年。另外, 萧纲与萧绎的关系也应该是考察《与湘东王书》写作时间的重要因素。因而从萧纲批评的对象在京师的主要活动时间和萧绎与萧纲关系角度, 考察《与湘东王书》的写作年限, 认为此书应作于中大通三年到大同元年间, 为学界缺乏论证而引起质疑的第二种看法作

¹作者简介: 李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

一推论支撑。

一、《与湘东王书》所批判的“京师文体”主要活动在梁中前期

“京师文体”是《与湘东王书》重点批评的文学流派，学界有的认为它包含裴子野体、谢灵运体的模仿派^①，有的认为它指任昉文学派或梁武帝文学集团^②。“京师文体”当指梁武帝文学集团效仿派，理由一是任昉文学派从属于梁武帝文学集团，且任昉在天监八年（509）就辞世，此后影响减弱，而梁武帝文学集团则一直占主导地位到梁代中期，与其说“京师文体”指任昉派，不如说指梁武帝文学集团，但这也不准确；二是萧纲作为太子，一直处于梁武帝的势力控制之下，即使到梁代晚期，梁武帝依然掌握大权，有决断太子之位的能力，况且梁武帝诸子都觊觎太子之位，萧纲不敢也不可能对之有所忤逆和批评。而梁武帝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学，形成了梁武帝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梁书·文学传序》曰：“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浞、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值文德，通谯寿光，皆后来之选也。”^{[6]685-686}而梁武帝奖掖文学之士的方式大大刺激着文人士子，据《梁书·袁峻传》载：“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6]689}可见其时京城有很大一批从事文学创作并希望以此走上仕途的文人士子，梁武帝文学集团的作品便成为京城文人士子效仿的对象，所以，“京师文体”应是指梁武帝文学集团效仿派。萧纲把它作为重点批评对象，认为它与裴子野体、谢灵运体的效仿派有共同的特点：模仿。但由于他们的创作儒钝阐缓，文学成就不高，尽管人员众多，却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无从考察其具体成员。

但是，“京师文体”兴盛的时间大致可以推断。梁武帝文学集团的活动主要在梁代前期，天监末年梁武帝舍身侍佛后，崇尚节俭清静的生活，文学活动削减，到梁普通及大通年间，其主要成员纷纷辞世，影响减弱，而以“通变”著称的萧统文学集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裴子野文学集团、谢灵运体效仿派、萧纲和萧绎文学集团为其辅翼，因此，效仿梁武帝文学集团的“京师文体”大致在天监初至普通年间呈兴盛态势，之后逐渐为其他文学集团所掩盖。

二、从裴子野文学集团在京师兴盛的时间看，《与湘东王书》应作于大同前

裴子野在梁代享有盛名，对梁代文坛影响甚大，《梁书·裴子野传》载：“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6]443}这样在他周围就聚集了一批文人，《梁书·裴子野传》载，“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稜，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6]443}《梁书·谢征传》亦云：“征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征，征为《感友赋》以酬之。”^{[6]718}裴子野文学集团以裴子野为中心，由刘显、刘之遴、殷芸、顾协、韦稜、谢征等一大批趣好相同的文人组成，其形成时间，日本林田慎之助认为在天监十年（511）前后。^[7]吴艳华《裴子野文学集团研究》认为，裴子野文学集团经历了结成、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天监十年左右结成，普通年间繁盛，大通年间没落^[8]。如果从裴子野文学群体的主要成员构成规模和活动来看，该集团始于天监初，形成于天监十年到普通初年，繁荣在普通中至中大通末年，衰落在大同以后，下面对此作具体考察。

² ①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一文认为，“京师文体”“具体说来主要是针对‘古体派’，即针对裴子野的文体模拟者和前述谢灵运的文体模拟者”（〔日〕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归青《南朝宫体诗》也认为“‘京师文体’就是那种‘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擅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况》一文认为，“京师文体”应指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指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元嘉三家之体以及永明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② 钟仕伦《萧绎与梁代古今文体之争》认为，“京师文体”指的是以任昉为代表的一派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刘林魁《试论〈与湘东王论文书〉兼及宫体文学理论》认为，“京师文体”是指梁武帝文学集团（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文2003年）。

裴子野在天监初以其所撰《宋略》为时人所赏，为吏部尚书徐勉荐之于梁武帝，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考订这一时间在天监六年(507)^[9]。不久，子野即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掌中书诏诰。普通七年(526)梁武帝北伐，子野受敕为喻魏文，得到武帝赞赏，“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6]443}，由此声名大振，迁中书侍郎。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直到中大通二年(530)卒于官。从裴子野的经历来看，他从天监初到中大通二年去逝，长期任职中书省，影响甚大，特别是普通七年得到梁武帝的重用以后，地位很高，对京师文坛的影响也非常大。

刘显，《梁书》本传载：“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6]570}刘显幼年号为神童，博涉多通。天监初，为尚书仪曹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后为秣陵令、骠骑鄱阳王记室，兼中书舍人，累迁步兵校尉、中书侍郎等。据《梁书·鄱阳王传》记载，鄱阳王萧恢普通五年(524)为骠骑将军，“(普通)七年九月，薨于州……中书舍人刘显护丧事”^{[6]351}，可知刘显从天监初到普通末年，除短暂为秣陵令出京以外，长期任职京师。在裴子野文学集团中，刘显活到了大同末期，但在中大通末年以后，他就出京为官，不在京城。《南史·刘显传》记载：“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波斯献生师子，帝问曰：‘师子有何色？’显曰：‘黄师子超不及白师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隐起字无识者，显

案文读之无滞，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时有沙门讼田，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后为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10]1240}《梁书·刘显传》亦载：“出为宣远岳阳王长史，行府国事，未拜，迁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6]571}《南史·昭明太子传》记载，萧誓中大通三年为岳阳王^{[10]1312}。又据《梁书·邵陵王传》载：“大同元年，(纶)为侍中、云麾将军。”^{[6]432}波斯国于中大通二年(530)首次献方物佛牙^{[6]815}，到大同元年间，有中大通五年(533)和大同元年四月两次献方物^{[6]77-79}，其献生师子应在中大通五年。据萧绎《法宝联璧序》所录，刘显中大通六年(534)所作官职为“前尚书左丞”^{[11]3052}，那么刘显此时被免官尚未就新职，大同元年前后才为岳阳王长史，改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后随王迁郢州，直到大同九年(543)卒。

也就是说，刘显在中大通六年以前，是很受武帝赏识的，长期任职中书省，而之后受武帝妒忌免官，大同元年离开京师，跟随邵陵王到地方为官，远离京师文坛，直到大同九年卒，都未回京师。

刘之遴初为太学博士、散骑侍郎、中书通事舍人等，普通年间为征西鄱阳王长史、南郡太守。“后转为西中郎湘东王长史，太守如故。”^{[6]572}据《梁书·元帝纪》载，萧绎普通七年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6]113}则之遴后为西中郎湘东王萧绎长史、南郡太守。后丁母忧，服阙，因不愿去郢州为官，被奏免。很久才又被起用为太府卿、都官尚书、太常卿。《梁书·刘之遴传》云：“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6]574}由此看，刘之遴上《春秋大义》等书在裴子野逝世的中大通二年以前，他至少在大通年间被起用。其后一直在朝廷为官，直到太清二年(548)避难还乡途中卒。从刘之遴博学多识却未参加《法宝联璧》的编撰来看，以其卒年七十二推知，刘之遴在大通末年已年近60岁，可能其时他已年老，对文坛的影响已减弱。

殷芸，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天监十年为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中书舍人，后为国子博士等，普通六年(525)，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卒。^{[6]596}殷芸从天监初一直在京任职，仕途平稳，长期在中书舍人任上，但他在萧纲为太子前已卒。

阮孝绪，终生隐居不仕，绝少与世人交往，即使是当时的名流任昉、殷芸等也未能与之交游，《南史》本传载：“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迒，其人甚远。’其为名流所钦尚如此。自是钦慕风誉者，莫不怀刺敛衽，望尘而息。殷芸欲赠以诗，昉曰：‘趣舍既异，何必相干。’芸乃止。唯与比部郎裴子野交。”^{[10]1893-1894}大同二年(536)卒。

顾协，起家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后迁安成王国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临川王萧宏召为掌书记、萧正德侍读。^{[6]445}

据《梁书·武帝纪下》载，普通元年(520)，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6]63}。顾协掌书记、为侍读在普通年间。普通六年，萧正德率众北伐，顾协入府为录事参军，掌书记。次年北伐军解散还，湘东王表荐顾协，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等。大同八年(542)卒，时年七十三。顾协早年的仕历主要在地方，普通年间也多随萧正德在郢州，后得萧绎举荐方长期在京任职。可见顾协加入裴子野文学集团，约在普通末，他是裴子野文学集团中为数不多的活到大同末而且活动在京城的成员。但顾协比刘之遴还大8岁，大同初已年逾60，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可能和刘之遴一样，都已经很小了。

韦稜，“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世之士，咸就质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太子仆，光禄卿”，^{[6]225-226}其仕历、卒年记载非常简略，难考。但据萧绎《法宝联璧序》所记官名来看，韦稜在中大通六年的官职是“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前仆”^{[11]3052}，则中大通六年左右，韦稜已由太子仆转为云麾长史、寻阳太守，由京师到地方任职。

谢征，《梁书》本传载：“初为安成王法曹，迁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记室，兼中书舍人。迁除平北咨议参军，兼鸿胪卿，舍人如故。征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又记“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又为临汝侯渊猷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6]718}元略北还，约在普通六年。《魏书·元略传》载，元法僧南附，梁武帝以元略为大都督，前往接引之，不久，魏征元略回国，梁武帝备礼遣之，置酒饯别^{[12]506-507}。据《梁书·元法僧传》载，普通六年，元法僧来奔^{[6]553}。则谢征在普通末年文名大盛。中大通六年，出为北中郎豫章王萧欢长史，南陵太守。大同二年卒于官。谢征以世家子弟的身份，年少便为中书舍人，一直倍受萧衍重用，他与裴子野、刘显、顾协文名大盛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此时是裴子野文学集团最为繁盛的时期。但在中大通六年以后，谢征为北中郎豫章王萧欢长史、南陵太守，出京，以三年任期推算，他很可能卒于南陵太守任上。

综合裴子野文学集团成员的构成和仕历来看，天监初到普通初期是裴子野文学群体的准备期，这一时期裴子野凭借他的《宋略》得到了当时人的赞誉和推崇，渐渐吸引了一些文人到周围，这一文学集团的兴盛壮大，则大约在普通中、末期到中大通末年间，此时他们方长期聚集在京师，并在此时其主要成员裴子野、谢征、刘显等名噪一时，成就该文学群体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裴子野的去世而衰落，而是凭借重要成员刘显、刘之遴等位居中书省的高位，一直影响文坛到中大通末年前后。随着刘显、谢征、韦稜在中大通末纷纷离京，到地方为官，阮孝绪于大同初卒，而刘之遴、顾协年老，这个文学集团的力量才消竭下去。所以从裴子野文学群体的情况来看，萧纲将之作为批判的靶子，在中大通三年到大同初期的可能性较大。

三、从谢灵运诗效仿派兴盛的时间看，《与湘东王书》也应作于大同前

效仿谢灵运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有王籍、伏挺、庾仲容、谢几卿。

王籍，《南史》本传曰：“籍好学，有才气，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10]580-581}王籍是谢灵运体的主要倡导者。《梁书》本传载：“天监初，除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历余姚、钱塘令，并以放免。久之，除轻车湘东王咨议参军，随府会稽。”^{[6]713}在游历会稽山水中，写下著名的《若邪溪诗》。萧绎为会稽太守的时间，《萧纲萧绎年谱》考在天监十八年(519)^{[13]82}，由会稽太守转为丹阳尹在普通三年(522)^{[13]89}。王籍在会稽应在期间。“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迁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湘东王为荆州，引为安西咨议参军，带作塘令”^{[6]713}，不久便辞世。据《梁书·元帝传》载，萧绎大同元年进号安西将军。^{[6]113}又《梁书·庾仲容传》载，庾仲容被免官，“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酣饮，不复持检操”^{[6]724}。谢几卿被免官闲居，《梁书·谢几卿传》记在普通六年^{[6]709}。又据萧绎《法宝联璧序》载，王籍中大通六年为“中散大夫”^{[11]3052}，则王籍普通末至中大通末年在京，与谢几卿、庾仲容等失志交游。大同元年，他随萧绎到荆州，此后便未回京。

谢几卿，谢灵运的曾孙。《梁书》本传载，几卿“天监初，除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侍郎，寻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徙为散骑侍郎，累迁中书郎，国子博士，尚书左丞”^{[6]708}后因在职纵酒，为有司所奏免官。又起为国子博士、河东太守、太子率更令、镇卫南平王长史等。普通六年，几卿随萧渊藻北伐，军败

而免官，回京居住在白杨石井，“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宾客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志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既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湘东王在荆镇，与书慰勉之”。^{[6]709}后未被起用而卒。几卿一生多在京城，后虽免官，但他与朝中官员欢宴往来，影响依然很大。其卒年难考。据《梁书·元帝纪》载，萧绎为荆州刺史在普通七年^{[6]113}，前揭王籍于大同元年出京，则谢几卿可能在普通七年到大同元年间卒。

伏挺，“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6]719}天监初，伏挺为中军参军事，后迁建康正，被弹劾免官。久而为尚书仪曹郎、西中郎记室参军，后累为晋陵、武康令。还京于东郊筑室隐居，“挺少有盛名，又善处当世，朝中势素，多与交游，故不能久事隐静”，^{[6]720}。普通六年，尚书仆射徐勉还宅养病，伏挺与之书信讨论仕隐问题，之后伏挺再次出仕，任南台治书，因纳贿而被弹劾，伏挺惧罪逃亡，后于天心寺出家。“会邵陵王为江州，携挺之镇，王好文义，深被恩礼，挺因此还俗。复随王迁镇郢州，征人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还京师。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侯景乱中卒”。^{[6]722-723}邵陵王为江州刺史，《梁书·武帝纪下》载在大同三年（536）^{[6]81}；为郢州刺史，《梁书·邵陵王传》载在大同七年（541）^{[6]432}。邵陵王为丹阳尹，据《萧纲萧绎年谱》考，大约在大同十年、十一年、中大同元年期间^{[13]247-248}，可知伏挺普通末年以后就远离京师，至少到大同十年以后才回京。

庾仲容，天监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安成王主簿等，后“迁晋安功曹史。历为永康、钱唐、武康令，治县并无异绩，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记室，当出随府……迁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除尚书左丞，坐推纠不直免。仲容博学，少有盛名，颇任气使酒，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酣饮，不复持检操。久之，复为谘议参军，出为郟县令。及太清乱，客游会稽，遇疾卒”^{[6]723-724}。此段记载似有错讹。《梁书·武帝纪下》载，大同三年闰九月，武陵王纪为安西将军、益州刺史^{[6]82}，那么庾仲容任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为尚书左丞被免官则应该在大同三年后，但根据前揭谢几卿、王籍不得志的情况看，庾仲容免官与谢、王相追随应该在普通六年到大同元年之间。又或许“二人时亦不调”之“时”涵盖仲容治县被弹劾不得志时。据《法宝联璧序》载，庾仲容在中大通六年前后为安北中记室参军^{[11]3052}。据《梁书·武帝纪下》载，中大通四年以平北将军、雍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安北将军^{[6]76}。则庾仲容任安北中记室参军应在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之前，中大通六年前后，庾仲容已入雍州刺史萧续府，主要活动已不在京城。

从谢灵运体效仿派来看，他们与裴子野文学集团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聚集在京城的时间主要也是在普通中期至大同元年之间，此时是他们文学活动繁盛的时期。大同以后，他们有的去逝，有的到地方就职，远离京城，文学活动及影响也就随之衰落。

因此，从萧纲《与湘东王书》中主要的批判对象“京师文体”、裴子野文学集团和谢灵运诗效仿派看，他们在京城的主要活动都在大同元年以前，这一时期是他们文学活动的繁盛时期，之后各成员或去逝，或远离京城，其文学力量衰落，不足以影响京城文坛。由此推知，萧纲把他们作为批评的靶子，应该是他们在京城活动频繁、势力较旺盛的时候，即《与湘东王书》作于萧纲为太子的大通三年到大同元年的可能性较大，而作于大同以后甚至大同晚期则可能性不大。

四、从萧纲与萧绎的关系演变上看，《与湘东王书》不可能作于大同晚期

一般来说，学界把萧绎看作是萧纲的最亲密的兄弟，文学上的同盟战友。然而萧纲与萧绎的关系应该分作三个阶段来看，萧纲为太子前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二人均为郡王，地位相当，二人也时常有书信往来。此时期萧绎与裴子野文学集团及效仿谢灵运体的诗人都有交往，关系亲密。萧绎《金楼子·序》云：“裴几原（子野）、刘嗣芳（显）、萧光侯（子云）、张简宪（缵），余之知己也。”^{[14]2}《金楼子·立言上》又载裴子野曾与萧绎论著书之事^{[14]810-811}。裴子野死后，萧绎为之作墓志铭。前揭王籍、谢几卿失意，萧绎作书安慰之，足见其情深。因此萧绎此时在创作上也应受到裴子野的影响。第二阶段为萧纲为太子到大同中期，萧绎与之感情联络更勤更亲密，在萧纲初为太子受菩萨戒的中大通三年，萧绎即有书信慰问。二人这一时期多有唱和之作，如萧子显作《春别诗》四首，萧纲有《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萧绎有《春别应令诗》唱和。此时也正是萧绎“西府盛集文学”^{[6]692}之时，萧绎荆州府聚集了刘缓、刘之亨、何思澄、刘孝胜、褚沃、到镜、颜协等一大批文人，势力较大。萧纲写信给萧绎，争取到他的支持，具备较好的条件。且萧纲为太子后，作为萧纲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庾肩吾入萧绎府为“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6]690}，也许他正是受萧纲派遣，前往实施与萧绎的联盟。第三阶段：大同中、后期至大宝二年（551）萧纲卒。此期二人关系开始发生

微妙变化。由于武帝年老，又加以纵容诸子，致使无法掌控局面，《隋书·五行志上》载：“（大同）十年十二月……是时邵陵王纶、湘东王绎、武陵王纪并权侔人主，颇为骄恣。皇太子甚恶之，帝不能抑损。”^{[15]627} 萧纲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为太子，遭到朝中大臣及兄弟萧纶等反对。作为嫔妃所生的萧绎对萧纲的太子地位最初应该是认可的，而到了大同时期，萧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大概从大同初开始，《梁书·南平王伟传》附子恭传云：“时世祖居藩，颇事声誉。”^{[6]349} 此时萧绎已经有意经营自己的影响力。大同五年（539），萧绎去荆州任，回京任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又受敕为军主，掌握军事大权，形势进一步恶化。萧绎在《金楼子·杂记上》中云：“余以九日，从上幸乐游苑，被敕押，伏蒙敕板军主。新从荆还，人马器甲，震耀京辇，百姓观者如堵墙焉。上诸子之中，特垂慈爱，赐赍相接。其日赋诗蒙赏，其晚道义被称。左右拭目，朋友改观。此时天高气清，炎凉调适，千载一时矣。上谓人曰，余义如荀彧，武如孙策。”^{[14]1283} 正是这种名满京师的影响和武帝的特别垂爱，以及手握重兵的地位，使萧绎有了觊觎萧纲之位的底气，而侯景之乱则给了他机会。萧绎在侯景乱中总各路兵马救援京师，可他却坐拥兵马不出兵，反而到处征讨自己的兄弟和萧统的儿子们，为日后称帝做准备。萧纲曾剪发为信物，托儿子冒死前往萧绎处求救，可萧绎并未出兵改变局面，以致酿成侯景篡权的大祸。且其不承认萧纲为帝的年号，意在不承认萧纲为帝的事实。由此种种行迹表明，萧绎对萧纲是心存邪念的，他贪婪、自私，萧纲对他的信赖并未换来萧绎同样的感情。

因此，可以看出，自大同中、后期，萧纲、萧绎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此时与之讨论文学，希望与之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随着萧衍大同七年（541）于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周弘正等讲经，萧纲、萧绎的主要兴趣也转移到讲经论玄上。《梁书·武帝纪下》记载：“大同中，于城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6]96} 萧纲还请朱异到东宫讲述武帝所制经义。湘东王也于江、荆间讲授玄学。显然，梁代学风在大同中期有大转变，以经学与佛学、玄学互参。萧纲、萧绎在其中推波助澜，他们的兴趣已经从文学转移到解经谈玄上。另外，《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起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15]1730} 也就是说，自大同始，文风已经改变，萧纲、萧绎的文学联盟已经见出成效，这也正可说明，萧纲树立宫体理论的《与湘东王书》应作于大同之前。

另外，有学者根据《与湘东王书》出自《梁书·庾肩吾传》中“累迁中录事咨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6]690} 后，认为“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之“时”指庾肩吾为太子中庶子时^{[5]151}，这一推断并不可靠。《梁书》中的“时”很多时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往往涵盖了所述几件事情的一段时期，有回述、倒叙的性质。如《梁书·裴子野传》中记载，子野为徐勉举荐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书诏诰。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时人服其博识”^{[6]443}。若以此来看，白题、滑国首次入贡应在裴子野掌中书诏诰时，以其后记普通七年受诏作喻魏文推测，子野任此职以及二国入贡应在普通七年稍前。然据《梁书·诸夷传》记载，滑国首次进献方物在天监十五年（516）^{[6]812}，白题首次献方物则在普通三年（522）^{[6]813}，时间跨度有七年之久。按古代任职三年为期的时间判断，这显然不仅仅是指裴子野掌中书诏诰一职的事情，也包括之前任职的一段时间。前揭《梁书》所记庾仲容事迹当也是如此。因此，《梁书·庾肩吾传》中之“时”并不能以庾肩吾为中庶子时推之，应该包括萧纲为太子置文德省学士之时的一段时间。

综合“京师文体”、裴子野文学集团和谢灵运体效仿派在京师盛行的活动时间，以及萧纲、萧绎的关系演变来看，我认为萧纲《与湘东王书》应作于中大通三年到大同元年之间。正是看到“京师文体”、裴子野文学集团、谢灵运体效仿派在京师势力兴盛，才使刚继承太子之位的萧纲想要扭转文坛风气。他又看到萧绎与当时势力甚大的裴子野文学集团以及谢灵运体效仿派交往甚密，而萧绎文学集团的势力也比较大，所以才从萧绎入手，争取和邀请萧绎与他一起致力于文学的创新，因而才写作了《与湘东王书》，并且在他与萧绎的联合中，开启了宫体诗盛行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 （日）林田慎之助.《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文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 [2] (日)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M].彭恩华,译.长沙:岳麓书社,1986:346-347.
- [3] 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J].文学遗产,1988(6):55-65.
- [4] (日)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M].韩基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5-186.
- [5] 刘林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系年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50-154.
- [6] (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7] (日)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M]//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47.
- [8] 吴艳华.裴子野文学集团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 2014:5-6.
- [9]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76.
- [10]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2]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4] (梁)萧绎,著.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5] (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